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地方社群的日常生活政治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100-2410-H-009-032-  
執行期間：100年08月01日至101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計畫主持人：林秀幸

計畫參與人員：此計畫無其他參與人員

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3 日

中文摘要：透過一個地方社群的派系、廟宇和國家結構的交手過程，本研究企圖理解地方社群作為主體，和作為客體的外在政治結構的協商過程，實是一個文化建構的所在。當 Bourdieu 以個人的 practice 和 field 的概念，來說明文化慣習(habitus)的形塑，本研究以地方社群為主體，國家政治結構為客體，闡述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社群之文化界線，如何提供一個緩衝空間—即本文所稱之縫隙，和既有的象徵貯存庫，讓前者得以類似手工藝式的創造手法，轉換外在的結構為地方的象徵建構，因而免除了一個政治風暴，也進行了社群自我的文化建構。本論文借用 De Certeau 與 Paul Willis 之日常生活政治相關的概念，說明在小群體或個人與外在結構相遇時，並不是簡單的文化抵抗的論述可以詮釋，而是操作或協商的過程與布局。這個操作布局的過程，是在本身的文化體系、外力的強度以及歷史契機各種力量折衝下，主體的抉擇，並從中進行文化建構、形塑認同。因此本文也將借用 Geertz 的論點：模糊文類界線才得以表現地方知識形構的特殊方法論，因為文化的相遇不是機械的累積過程。也因此文化認同不可能形塑於歷史之外，歷史、政治與信仰也在這個過程中互相建構和競奪。

中文關鍵詞：日常生活政治；地方社群；界線；國家；象徵建構

英文摘要：The authors explore the negotiating process between subject (a local community) and object (a broader political structure) through encounters among local political factions, religious beliefs, and the State. In contrast to Bourdieu's emphasis on habitus formation using the concepts of individual practices and fields, we use the concept of interstice to create a locus and symbolic repertoire in which the subject establishes a bricolage to transform the wider structure into a local symbolic construct (we use the concept of interstice where the subject using symbolic repertoire establishes a bricolage to transform the wider.....). We borrow from DeCerteau's (De Certeau's)'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and Paul Willis's 'symbolic creativity' to interpret how a subject operates in a manner that differs from cultural resistance (the simply coined 'cultural resistance'). We suggest that a subject's 'art of making' results from interactions among a cultural framework, larger

system, and historical occasion, and that this trajectory proceeds from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identity—that is, an unpredictable ' grounded aesthetic' that bend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flow. Inspired by Geertz' s work on blurred genres, we adhere to a specific textual style that moves from individual perception to a broader structure

英文關鍵詞：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identity formation, local community, state, symbolic construction

## 地方社群的日常生活政治成果報告

本研究藉由一個台灣地方社群的歷史事件，企圖理解地方上的人們在政權轉換之際，送走一個舊的日本政權，迎接一個看似文化傳統接近的新政權時，當地人表達出的集體情感狀態、政治操作以及相應的文化建構行為。一個政權空窗期的在地宗教行動，卻不自覺地捲入高層政治鬥爭的共振波裡。面對一個危機四伏的政治新局，在地行動者採取何種策略因應？藉由對這段歷史的探索，我們企圖理解在地人如何理解這個新的政治外力？在地自保的行動裡有多少政治性和文化性？這樣的在地策略和既有的地方文化體系有何關連？如何協調新元素和舊格局？這不僅是地方社會如何遭逢外來的結構性權力的議題，也是社群「界線」在衝突與張力中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以及「地方政治」如何與日常生活交錯出含有「文化面向」的政治策略的議題。

以「地方」作為研究場域，乃立基於研究者過去在地方社群的研究基礎。過去大部分有關象徵建構的社會學研究將「能動者」(agent)放在個人的層面，例如 Goffman 和 Blummer，甚至 Bourdieu 對實踐場域的立論，「個人」皆扮演文化象徵的接收者、承載者和行動者。本研究以「地方社群」為「能動者」，恰恰是要理解地方社群的「界線」在政治衝擊的過程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而這個角色可能位處政治與文化的模糊地帶，這樣的模糊性，也許正透露了**地方政治的多重性和混義性**。F. Barth (Barth 1969) 和 A. P. Cohen (Cohen 1992)，皆著力在社群界線本身的建構能力，聚焦在社群區辯他者，自我認同的動力，因此文化成為建構界線的政治元素。然而本研究透過一個政治外力與社群交會時產生的緊張關係，窺見社群「界線」「能夠」扮演的角色或許更為多面向，其效力亦從當下延伸到未來，也是本研究使用「縫隙」的概念的意義。我們想要理解在這個交會過程裏，社群界線是否形成一個緩衝空間，而其文化象徵庫如何提供應對和協商之道？地方人士在其中的抉擇受限於（或被賦權）多少既有的文化象徵體系，政治結構和歷史機會？

除了試圖透過在外力震盪下的地方操作，來理解地方政治在有限空間裡的文化性和政治性之外，本研究也嘗試探索不同的文化或觀念體系遇合的問題。不同的文化或觀念體系遇合的議題，主導了近幾十年來文化相關的大部分研究，這類的研究經常以「拼貼」或「混搭」來描述現象。然而文化相遇的問題，不應該只限於表象的描述，如越南人在春卷裏擺生菜，或是台灣人的掛包長得像漢堡之類的，如此無法幫助理解兩種知識體系的特性，和隱藏在表象之下的文化、知識重構過程。以 C. Geertz 的觀念而言，文化的相遇不是某些符號的累加或拼裝 (Geertz 1983)，縱然我們在外表只看到文化符號的累加，如新娘禮服改變成白色，或是義民廟多出一位配祀者。這些不同知識與文化體系的遇合和重新建構過程，不是數學的微積分，但是帶著「質」的轉換。影響的因素包含原有文化體系在個人認知裡的結構，新力量被理解的方式，重構的過程等，這些都必須在日常生活的體會和行動中被實踐出來。這一整套的過程，就是當地人製造意義的過程，也是象徵建構的過程。其中社會的結構面，個人的心理結構，歷史的機會等等，皆是必須考量的面向。然而如何傾聽它的多層次意涵，以及表象下文化建構的全貌，是本研究藉由詮釋研究方法想要理解的，這種對事件全貌的理解將幫助我們觀察該群體在未來面對新的外力時的反應。

過去地方派系的研究比較集中在探索結構面的勾連，釐清地方政治和中央政權的合謀過程，給予台灣的地方派系研究一個堅實的基礎。然而地方政治在

地方文化和地方知識的浸潤，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政治運作，有其日常生活文化的紋理，是較少被觸及的。如果我們暫且不要以結果論，也就是往後建立起來的侍從體系而論。而從政權轉換時的空窗期和其後的交手，來試圖理解地方政治其文化與政治的交錯，我們或許可以對地方政治有其它面向的認識，並由此基礎來銜接解嚴以後，新的政治空間裡地方政治樣態的相關研究。這樣可以拉大視角，延伸觀察地方在面對其他外力－國家或全球化格局下（或限制下）的互動反應。

人類學的研究被認為過度侷限在一個小地方，而看不到更大範圍的政治經濟力量。這些指責雖然在 80 年代經由 Marcus 和 Fischer(1986)的論辯已經不大成為當代人類學家的問題，然而人類學的書寫比諸於社會學或政治學、經濟學，確實要更在意個人的、小群體或地方的位置，以及他們的認知與情感的結構和動態。換言之，我們幾乎可以說人類學者更注意環境的氛圍與風情，以及成員的心理狀態。而社會學家被認為對政經結構、制度、國家、客觀情勢等具有較敏銳的觀察力和解析力。那麼如何結合兩者的優勢，把個人或小群體的情感與認知和更大的結構結合呢？Geertz 的「文類界線的模糊：社會思想的重構」（Blurred Genres: The refiguration of social thought）（Geertz 1983）一文所闡述有關「方法論」和「文體」之間微妙配合的關係。

## 二、方法論和文體

如 Geertz 所言不同的知識體系相遇時，所涉及的並非符號的累加或拼裝，而是一種帶著質變的重構，那麼社會科學要如何捕捉這樣的過程呢？詮釋人類學的開創者 C. Geertz 的作品：「地方知識」正是企圖要解決這個研究方法上的難題。其不僅牽涉「方法」，也涉及學術作品的「文類」，這才是 Geertz 以「地方知識」為名，實欲開創知識遇合過程的方法論的企圖。因此 Geertz 在該書的第一篇文章就題為「文類界線的模糊：社會思想的重構」（Blurred Genres: The refiguration of social thought），就是要為整本書定位在研究方法和論文呈現的問題。他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路數的改變將直接影響到「論文體裁」的可能性，因此他把「論文文體」的可能性和「研究方法」的開創性勾連在一起。

Geertz 認為當社會科學放棄化約論，從尋找因果關係的動力擴展到對於社會文化現象的關懷時，過去的研究方法需要被檢討。尤其是在多元文化，多種認識力遭逢的空間裡。當地人是如何面對一個新形勢（譬如一個新的政治形勢），一個新的價值體系（譬如異文化或現代性）？Geertz 認為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必須聚焦的是，當地人如何因應，作怎樣的自我敘述，尋找什麼樣的意義性，如何建構新的文化形式等。從學科界線而言，就是歷史變遷、社會文化與個人心理之間的互動，那麼如何捕捉可能的歷史情境、社會文化地圖和個人心理動機將是研究者的任務。Geertz 告訴我們，脈絡（context）是重點，當地人建立一個有意義的敘述是核心活動，而這些屬於象徵建構的範疇。

當我們試著去呈現「這些人群的社會價值」，想像「那個時代的氛圍」，深入理解「這些個人的心理圖像」，而這些面向又如何共同進行意義性的建構時，

有時候會像是「加了分析性修辭的小說體裁」( Geertz 1983: 22 )。當研究者必須適度運用想像力來捕捉這些非物理性的現象時，社會科學應該大量的自其他學科範疇借用方法。Geertz 列舉了一些重要的影響來說明。

譬如 J. Huizinga (1980) 以「遊戲」的觀點來詮釋文化：遊戲裡有其特有的隱藏規則、策略、參與者發動的行為、自我獎勵等，其自成一個意義系統。而這些和祭祀，政治治理的體系沒有差別太多。另外 V. Turner 引用戲劇觀點來理解社會文化的建構，他認為「社會劇」幾乎發生在社會組織的每個層面的衝突中，從家庭到國家。例如陷入派系的村落，地方對中央的抵抗等。他認為衝突發生時，人們情緒的緊張性必須被導入一種集體的情感模式與展演來化解衝突，否則社會體將在不斷地爭端中被撕裂，這就是集體的儀式或節慶的政治戲碼，這樣的政治劇也反過來模塑權力與階層 (Turner 1982)。「政治劇」的說詞並非隱含「遮掩」或是「表面」的義涵，這裏的「集體性展演」是一種對高度張力的情緒與情感的表達模式。儀式涉及最個人層次的心理狀態的模塑，到最集體的政治治理形式，因此涉及本體論 (ontology)。它是人們的生活框架，得以規範社會，但是並不僅是外在的，而是將身體感整合進去的表達，形塑人們的經驗，並使人們成其為一體，有其深層的哲學意涵，也有其實務的政治效應。而當遊戲性穿插進入儀式性時，陰謀巧計、展演等人文學的名詞也被拿來說明動機、權威、交換、階層等。在這種情況下，介於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界線似乎很難清楚劃分。

而文本 (text) 比喻雖然容易引起疑義，然而如果聚焦在「意義如何停泊」的過程，則展現出這個路數的有效性。一組觀念體系就像文本一般，被理解和被記憶的前提是，其意義必須是停泊的。然而從「事件」變成「歷史」的過程是如何辦到的？從「念頭」到觀念體系、從行為到文化體系又是如何形塑的？這些過程不是靠因果與結構分析可以達到。我們或許可以從文本建立的模式中獲得啟發，當地人是如何將一個具體發生的事件，轉變成他們的制度或歷史的過程，必須進行一個對自我有意義的敘述，這個敘述是如何完成的？也就是一堆象徵如何組合成有意義的表達。我們想要了解的，不僅是象徵體系意味著甚麼，而是，她們如何傳達意義，如何辦到意義的定泊，讓人們得以認識與領會。在一個多種認識力的空間裡，這點尤其重要。

綜觀以上被提及的各種進路的影響，我們想從歷史變遷中深究人們的表達，人們如何因應新局？這是從衡量「物理的力道」到注重「象徵形式」的研究進路。過程中我們必須一再詢問自己：「人們是如何思考的？如何表達？如何銜接不同的觀念體系？」在在都顯示出，描述、想像與詮釋的重要，從這樣的理解當中，得以探索人們文化圖譜的寬度，心理的深度，和社會形勢的變動性。因此一種「混合文類的體裁將是不可避免的」。Geertz 這樣說。

Geertz 另一篇重要的文章「常識作為文化體系」( 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 ) ( Geertz 1983 )，看來像是處理地方知識裏的「常識」特性，然而 Geertz 的企圖實乃要碰觸文化或觀念體系遇合的問題。Geertz 費了一些功夫要找出地方生活裡「常識」的特性，為的就是要替這個舊命題找到一些新眼光。常識的特性異於知識，因此如果「常識」遇到「知識」，會產生非線性累加的變化。逼近「常識」的特性，才能幫助我們找出如何看待「相遇」的事實？Geertz 用了一些「你無法」的描述來幫助理解常識，想來「常識」不是容易捉

摸的認識力：「你無法清點它們的內容」「你無法用邏輯結構來類推它們」「你無法用加法累積它們」。「你只能試著叫喚出它們的語氣 (tone) 和性情 (temper)」(Geertz 1983:73-85)。在試著勾勒常識的特性時，Geertz 用了一些不精確的辭，甚至接近美學用語：「語氣」(tonalities)「風格」(stylistic features) 和「態度特性」(marks of attitude) 來逼近常識的特性。總之，它有別於範圍確定的概念。Geertz 花費篇幅試著描繪地方空間的常識特性，不是為了單一的「地方」領域（這是不少相關論文引用 Geertz 時常犯的錯誤），他的目的是為了探索地方的常識和更大結構的知識遇合時，會產生甚麼變化。如果知識的特性在結構性和制度，而地方常識的特性為幽微的感知性，那麼他們的遇合就不會只是結構性的累加，例如  $3+5=8$ ，而是一種更具深度的化學變化，這需要從日常生活中去捕捉。

「混搭」、「拼貼」或「歷史的疊層」，這些詞經常出現在相關論文裡，像是衣服配件的搭配，或是微積分一般的累積，然而 Geertz 在這裡提出警語：「不要用結構功能論的清點，而是必須用「詮釋」(interpretive)」(1983: 93)。因為知識與常識的相遇，有許多「偶然」：歷史給的機會，權力落差（政治結構），以及兩種「認識論」不同的質感、速度、和力道的相遇，甚至不同的空間感的相互逼近。因此它不是表面所見的符號的拼貼，而具有隱藏在事件底下的文化建構過程的全貌，有其文化的「殘留」或「基底」，以及在地方空間實踐過程時的特殊質感和語氣。當然無法用清點得知，而得適度運用描述、想像和捉摸。

Geertz 透過認識論闡釋研究方法和論文文體的關係，以及此方法對當代社會科學的必要性。然而要如何詮釋呢？涉及結構，空間特性，個人感知，集體情緒，地方氛圍，美感經驗，常識判斷等。如果我們不想流於結構制度的清點，或個人臆測玄想，「詮釋」的方法還是必須有某種原則。這時候我們必須回到詮釋學在哲學上的基礎。

在本研究中，個人的心理動機，文化模塑下的精神結構，地方的氛圍，文化的象徵網絡，派系互動，上層的權力結構與鬥爭，這些都互相構成詮釋循環裡的「整體」與「部分」，也是不同層次力量的互相交駁、角力和形塑。我們的挑戰是如何以高度創造性的手法，深入每個層面，掌握不同層面的特性，想像個人，印證結構。在不斷地來往間，企圖理解當地人如何製造意義性，其外在反應，內心的殘留。而深沉的文化基底，個人的自我犒賞動機，權力鬥爭的遊戲性和高風險等，都可能是牽引我們走出詮釋迷宮的軸線。

義民爺不是單獨的一個符號，祂是整個信仰體系的一個部分。大湖地方社群宗教信仰的基本語法是：年初年尾對天神的祈求與感謝，山邊土邊伯公隨時隨地的護佑，地方有開基主神關帝爺坐鎮，形塑地方精神、記錄地方歷史，陪祀的媽祖婆也有一年一度進香的盛事—標示著移動和連結更大社群的想像。義民爺處在一個位置，祂是居民對開拓時期社群奠基者的崇敬，而這樣的崇敬帶著幾分對無人祭祀的孤魂的憐憫，一種類似地方性祖先的象徵。當關帝爺無可取代地坐鎮在街市核心的位置，位階崇高如天后也只能陪祀在旁，增加地方的多面向意義。義民爺的前身則是社群開拓孤魂，位處在社群邊緣，既被地方崇敬也被憐憫。當祂因為歷史的進程—軍事需求，而被轉換為義民爺時，祂被從「歷史的」轉換到「隱喻的」。而這個隱喻指涉的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組觀念和行動。不僅指涉最深層的信念—對孤魂的憐憫和對奠基者的感激，赦罪的

心願，也暗示慷慨給予是地方威望的累積。還聯想到和新竹地區的區域連結，一個**類似誇赴宴的意義叢集**。這是地方頭人的舞台，透過對義民爺和其它孤魂的誇富宴—中元祭典，地方頭人累積和宣示他的地方威望，和連結其他區域的潛力。羅福星英雄事蹟和這個象徵指涉是相符的，再一次地，「歷史的」轉換到「隱喻的」，透過祂的歷史事蹟和跨地域名聲，得以和國家層級的政治對話。然而仍然不忘指涉其最深沉的—感激、憐憫、赦罪，慷慨給與和地方威望的累積—誇赴宴的意義叢集。

大湖的菁英將義民廟更名為「昭忠塔」時玩了一個戲法。義民廟仍舊是義民廟，昭忠塔則位在廟後，成為納骨的所在。這樣的安排合乎當地的禮法：遺骸埋在廟後。大湖人仍舊稱其為義民廟，仍舊是一年一度中元普渡之所在。昭忠塔是展現給外地人的，是拍照留影的風景。羅氏等成為義民爺的陪祀神，在義民廟所處的信仰脈絡裡成為一員，信眾並不追究個人的事蹟，信眾所信仰的是信仰體系的「**整體**」，以及**義民爺所處的位置和引發的意義叢集**。如同我的母親不在乎她拜的神有著甚麼歷史評價，她崇拜的是這個信仰的整體。

這樣的操作是在內、外之間的，一邊是焦躁不安的權力擁有者，另外一邊則是地方。外力和內部衝擊面的所在、大小和強度，影響著內部的反應和自我形塑。生活恰恰就是在這個縫隙中的創造，是一個「之間」的處理，有時候屈從，有時候協商，有時候反抗，有時候以屈從換取時間和空間。這些完全是當地人的判斷和決定，「**之間**」是一個**自我得以操作的所在**，在其中進行象徵的建構。也從中認識他者，形塑自我，認同因此不是獨立於歷史之外的（Willis 1990）。每一個決擇取決於外部脈絡、結構的形式和強度、內部的信念和價值、文化體系種種。而每一個決定都在創造自我，形塑歷史。

當執政者辭嚴厲色地要求講某一種句法時，地方上的人用對方的符號置於地方的句法裡。這是一種力道的轉折，**猶如折射線轉折於兩個不同質地和厚度的溶液裡**。就如 Geertz 所言，這不是結構的累加，而是整個句法的轉變，甚至保留地方原有的語氣。羅福星在國家層面有其結構上的位置，對大湖人而言卻是連結於地方的誇富宴的意義叢集。抗日英雄成為陪祀神，廟殿的牆上、樑上掛滿了政要的匾，還多了一座經過官方認可的昭忠塔，它成為觀光的重要景點。然而如常地，每年農曆七月二十四，廟前祭品堆積如山，人山人海，道士升壇講經，小孩等著收場賑孤時灑下的糖果餅乾和零錢。兩種句法和語氣在不同的空間裡傳達不同的意義，他們（祂們）一直共存於歷史和信仰中，一下提醒了這個，一下提醒了那個。有人選擇只看到廟宇和信仰，有人選擇看到權力的認可，有人關心儀式如實舉行，有人回憶那個假意笑謔的戲法，一方面有愚弄權力的快感，一方面對於大湖曾經離核心那麼近於有榮焉，歷史「事件」和信仰的「隱喻」就這樣互相建構也互相競奪他們傳達的意義。

大湖人從這樣的歷史與信仰的互相建構和競奪中摸索著自我的模樣：我是誰，我將變成什麼樣？大湖也在這樣的經驗中形塑她的地方氛圍和在地美學，作為一種日後面對它者的「態度傾向」，有如 Geertz 所言的「態度特性」。「信仰的」和「歷史的」一直在同台演出，前者如同布幕背景，後者猶如不斷替換的演員，他們缺一不可。一如潛意識的能量需要意識面加以「具體的實現」。他們之間的聯繫，或許情投意合，或許若有似無，或許呈現分裂。做為社會能動性的個人或群體，必須加以對照、辯證和調節。歷史的真實性相對於宗教的象徵性，在那個混亂的時代，譜出一個獨一無二的劇碼，作為這個地方社群的文化建構和認同建構的一部分。



這樣的歷史經驗，也讓義民廟在日後比其他廟宇更具有和外界對話的彈性。民國七十幾年，義民廟相較於關帝廟帶著較陰的氣氛，沒有搭上台灣富庶造成香油熱錢的風潮，廟裡財務拮据。主事的頭人們以彭木昌為首，商量著如何找經費維持廟務運作。台灣當時流行著納骨塔的風潮，於是這些理事們糾資建了一座彼岸塔，緊鄰在主廟旁邊，讓地方上人的身後事多了一個選擇，廟裡也從此多了一個豐富的財源。然而這個決定冒了一些風險，地方的奠基者和義民爺畢竟具有整個社群奉祀的合理性，而個別的祖靈從屬於私人的範疇，如何和原有的信仰相容？在蓋這個塔時，他們特意隔了一些距離，並且讓該塔比義民廟退後一些，而地藏王菩薩坐鎮該塔，成為前殿的主神。稍微銜接了公和私之間的衝突，讓它成為一個可聯繫的連續性光譜，在信仰的整體裡。

是的，每個事件都是一個抉擇，政治、經濟、信仰都要求被照顧到。義民廟多了靈骨塔服務之後，經費逐漸充裕，有了餘錢可以美化環境。幾年前主動和公部門交涉，爭取了一筆經費在一塊空地上蓋了羅福星紀念館，展出羅氏的相關文物，以及客家農村文化的物件，並將這個景點和最近竄起的地方產業—觀光草莓農園連成一個旅遊動線。最近又有議案要建活動中心，增加地方上藝文表演的場所，但是在理監事會上被否決，原因是有可能會遮到主廟的視野。對理事們來說，每年七月的普度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儀式，廟前廣場必須有足夠空間讓人擺牲儀。雖然基於過去的政治經驗，義民廟展現出和外力、大環境交涉的信心，然而卻還小心翼翼地照顧著原有信仰的結構。對信仰和儀式的堅持，讓他們得以防止遺忘，繼續傾聽內心最深沉的迴盪，那是和地方社群相關的信仰叢集，雖然沒有人知道這會持續多久。

## 五、結論

本研究試圖以詮釋研究方法，運用 Geertz 提出的儀式、遊戲和文本的類比，進行大湖義民廟的歷史、信仰和地方政治的詮釋。透過一個有分析性語彙的故事體，我們從中窺見地方上人在內心深沉的信仰體系以及外部力量之間所創造的地方空間，這個創造是高度象徵的，有屈從、戲弄、協商、反抗種種的可能，這種縫隙間的創造性，正是生活的主要場域和內涵。人作為能動者，生活在地方，秉持其信仰的整體性，和外在的政治經濟結構交手。我們怎麼看待這個過程呢？是地方上人的一種「文化抵抗」？還是妥協？這些走捷徑的定論都太過簡化。問題在重組的語法，和新的象徵布局，這個布局有多少受制於結構外力，有多少奠基在既有的文化觀念體系、信念和關懷，而地方人士的判斷與抉擇不是既定的，是行動者在歷史的契機，外力的強度和自我期許間的抉擇，也在抉擇中形塑自我認同、態度和摸索未來，而我們選擇觀看的时间也必須拉長到半個世紀以上。

義民廟因為它在信仰結構裡的特殊位置，成為社區頭人的場域，讓義民廟和地方政治的運行有非常緊密的關係。也因此地方派系作為地方政治的一種表現，和大湖義民廟共譜的一段曲目，讓我們窺見政權轉換之際，地方政治的反應和表達。它不僅要在地方內部的價值和氛圍裡累積威望，也必須有足夠的機動力面對外力的衝擊。作為兩種「現實」的媒介者—國家和地方之間，地方政治的行動者最能感受「抉擇」的歷史效應。在中央政權短暫的空窗期，這些地方頭人也強烈地希望在其內部的價值裡形塑認同。然而一如 Willis 所言，**認同不會獨立於歷史之外**，這個新政權進入這塊土地的方式和力道，決定了這個建構過程。地方派系在其後國民黨執政的歲月裡，成為中央政權的附庸和共生

者，讓人喟嘆這個政權吸附的效力，與地方的順應，本研究恰恰揭示了這個馴化的過程。然而地方上對信仰「整體性」的維護與價值的堅持，以及相關的情感結構與在地美學卻掩藏在地方的日常性裡，以及宗教的象徵圖譜裡，難以簡單勾勒，卻仍隱而不彰地運作著。在日後另一種政治結構下，亦有可能萌芽作用在地方的運作裡。過去台灣地方派系的研究聚焦在派系和鉅觀政治結構的合謀關係，不管是在戰後或日治時期的歷史脈絡中。本研究利用一個政權空窗期的歷史事件，得以窺見地方派系的地方質感、與宗教信仰和情感狀態的互相形塑、互為指涉的關係。地方派系也難以離開地方情感的共振關係，而此情感狀態被信仰相關儀式以及象徵體系所框架和維繫。其後新政權的降臨引起的震盪，以及地方派系對它的利用、應對、欺騙、屈從、共謀種種手段，說明了地方派系多面向的個性，以及當事者在當下局勢中的判斷和行動，這樣行動援引了地方的文化資源作為屏障和遊戲空間，雖然戲謔，仍不乏反過來加強地方性和文化性。因此本研究補充了地方派系在微觀層次的操作過程，時間點涵蓋新舊政權交接的空窗期以及和新政權交手的最初經驗，得以窺見介於地方和國家兩種現象之間，地方派系認知事物的方式和位置，既不可能外於地方氛圍，亦能和外在權力交手的屬性。它埋身於地方的象徵體系中，伸展於新的權力佈局中，歷史階段中的屈從和共謀來自於當初外來政權的嚴苛性，然而它的無法外於「地方性」的根，卻可能在不同的政治佈局中有新的發展。

Bourdieu (1977, 1990) 為了消解主體和客體的矛盾性，企圖結合結構主義和現象學的研究方法，所提出的「慣習」(habitus)，「實作」(practice) 和「場域」(field) 的概念，雖然某種程度讓人理解在結構增生過程中，主體的主觀感受、行動與抉擇。然而其結論卻太過於強調主體將結構內化與被吸納的過程，雖然是經過主體心甘情願的認同其價值和知識。本研究在一個真實的歷史過程裡，探索主體與客體之間，其實存在著一個文化的空間，也是本文所稱的「縫隙」。經常是宗教體系或者稱文化體系所提供的空間，讓主體擁有一個避免和結構力正面衝擊的游移空間。在這個文化縫隙裡，人們得以遊戲、反思、應付或抵抗，在其中進行文化的建構。而這個文化建構和原有的文化體系具有的關聯和變更，是主體運用各種感知和認知能力後所做的抉擇和判斷。在這個案例裡，主體並未違背原有的文化體系的框架，然而使用了一種類似「戲法」的拼貼。有如 Homo Ludens (Huizinga 1980) 的作者所闡述的，文化建構的動力和遊戲的動力是非常接近的。在關係裡謀求某種可以繼續下去的互動形態，這個過程是動態的，因地制宜的，也是互為消長的。如果說，Bourdieu 所闡述的「慣習」(habitus) 是在當代社會的「場域」(field) 裡，由個人所發展出來的慣習。那麼地方社群特有的文化體系，允許一種類似群體性遊戲空間，和外力的交手過程也建構了群體的認同，一個未曾結束的過程。

當我們行走在這個地方的空間，它的地景，它的建築和裝飾，它的符號，在在暗示我們領略各種力量折衝下的文化建構。是信仰的、是政治現實的，看到國家留下的痕跡，也看到地方人的抉擇與布局。是的，它是獨一無二的，不會再有同一個「創造」在其他地方出現。我們用身體感和認知能力領略這個創造，也感受到這個「地方特有」的氛圍，這是一種形塑中的認同建構，不斷地形塑中，在各種力量之間…。

#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2/12/13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地方社群的日常生活政治
	計畫主持人: 林秀幸
	計畫編號: 100-2410-H-009-032- 學門領域: 人口、家庭與社區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0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林秀幸		計畫編號：100-2410-H-009-032-					
計畫名稱：地方社群的日常生活政治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1	1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無。</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藉由歷史事件的資料蒐集和耙梳，當代的訪談，本計劃有效地勾勒、描述地方社群日常生活政治如何與地方宗教結合，並且以儀式實踐和信仰美學為基底和框架，來進行政治協商。過去的相關研究比較著重在特定派系的資源運用和政治利益網絡的分析。本研究補充了地方政治在民間美學和共識的分析，地方文化如何提供保護傘和創造平台，內、外政治勢力得以進行協商。這樣的協商過程，有著地方生活不同面相的介入和考量。因此，地方政治在新的全球化脈絡之下，如果不是過去的地方派系得以代理協商過程，會是什麼力量和可能的形式，本研究提供了一些預測的可能狀態。由於是精神狀態、信仰、美學、政治現實、歷史契機的共構，所以本研究不提供確切的「答案」，但是提供思考和預測的方向。讓我們得以掌握比地方派系更為本質的政治力量和能量，這種亦正亦邪的地方特性，會有哪一種發展，必須佐以當代外部政治的考量。